老师的骄傲

史中兴

一位从教六十年的中学教师出现在央视“开学第一课”的课堂,主持人问她，这么多年您一共教过多少学生？回答是:八千。

这些学生遍布各行各业，有科学家、教师、医生、航天员、电视台主持人、官员,以及各个普通岗位上的劳动者。主持人又问,“这些学生中,请你举出几个特别值得你骄傲的人。”

老师的学生中，很有几个出名人物，但老师并没有报这些人的名字,她的回答是,我教过的学生,我都为他们感到骄傲。此时台下响起热烈掌声。

这个回答，也让我眼睛一亮。我想,她教过的学生,不论是出名的还是默默无闻的,听到这个回答,都会感到温暖,啊,老师心中有我们!

老师能这样回答，也是表明在长期的教书育人工作中,她的心血汗水浇注到每一个孩子身上，她的爱心一视同仁地奉献给了每个学生。

我有一位忘年交白领朋友,近日为孩子要不要转学的事纠结。我问她,这是所很好的学校,孩子学得好好的,为什么要转学?她说孩子抱怨这里的老师不喜欢他，老师眼里没有他,也不是完全没有,是有时有,有时没有。别的孩子把废纸扔到地上,老师只当没看见,他把纸丢到地上,就说他。和别的孩子发生争吵,老师不分青红皂白，首先批评的总是他,出点错就抓住他不放。我们两口子不是知名人物,不是大款大官,我们的孩子老师不关注。白领朋友由此得出结论，这位老师是戴有色眼镜,不是一视同仁,没有善待她的孩子,使孩子很沮丧,不想去这个班级上课了。白领朋友的话自然是一面之词,可能有偏颇之处,但学生家长同样的纠结，我听到的不止一次。有的家长还提出，要把老师搞定,使孩子能多得到老师一份关注,这样才放心。

世象杂谈

有的老师比较偏爱一些成绩优秀的孩子，对成绩较差学生缺乏鼓励与耐心,似乎不自今日始,但由于学生家境差异而引起的差异化对待，这才是市场化的当下特别需要警惕的现象。学校不是真空,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在学校也有反映。有的教师对学生家长职业很感兴趣,当老板的还是当官的,能给赞助的还是不能给赞助的，节日的小礼品有含金量还是没有含金量的,如果把这些都一一掂量在心，对待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就很难没有亲疏厚薄之分，有时可能是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,孩子很敏感,回家就会向家长倾诉,老师如果有意为之,孩子受到的伤害更大，纯洁心灵会受到市侩气的无情侵蚀，这样的老师,师德不彰,是当不好老师的。如今有些家长害怕老师来家访。家访本来是一件好事,借此机会家长可以和老师沟通，自然有利于对孩子的培养教育,怎么反而害怕呢？这就不正常了。

家长最担心的是，自己的家庭状况会不会影响老师对自己孩子的看法，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在老师关注的视线之内，投向自己孩子的是不是同样的目光？如果老师都能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老师一样,把自己所教的孩子都视作自己的骄傲,家长还会有这样的担心吗?

中行楼高之谜

邢建榕

1934年英商建筑设计事务所——公和洋行为外滩中国银行设计新大楼时,堪称大手笔:一座双塔形的ART DECO高层建筑,最高处300余英尺,换算下来约91米,34层,远高于隔壁沙逊大厦13层楼的77米。设计效果图配发的文字令所有上海人异常振奋:“第一幢摩天大楼俯瞰着上海外滩,被提议的中国银行新大楼”。

不料拆下脚手架,原本准备好好庆祝一番的上海人,只见落成后的大楼,莫名其妙比沙逊大厦矮了1米。种种传说由此而生,最为流传的说法是，中行大楼从34层楼降到18层楼,再降到17层楼,完全是隔壁那位跷脚沙逊从中作梗所致。他仗着高额纳税人的缘故，从租界工部局一路告状到了伦敦，硬生生将中行大楼压低了一头。

可这一说法竟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据。笔者查找了1933年至1936年的《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》,同样未发现董事会讨论过中国银行大楼建筑的事宜,也未发现任何与沙逊有关的记录。有文章说沙逊向工部局董事会施加了很大压力。不过要知道,工部局董事会的董事中，有好几位中国人，其中贝淞荪还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,中行新大楼的实际负责人。

中国银行大楼降为17层楼,显然受到了1934年后蔓延的白银危机的影响。因为来势汹汹的白银危机，中行财务状况不容乐观,于是决策者很快调整思路,降低预期,而使34层大楼的设计方案只能束之高阁,流于纸上。这是中国银行楼层大缩水的一大原因。

问题是，中国银行为何一降再降,从18层楼降为17层？如果说从34层大幅降低到18层,还好理解,那么再降一层,又作何解?因为这一层楼,就牵涉到谁是外滩第一楼的问题,实在非同小可。

难道中国银行真的因为白银危机，连一层楼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吗？这一可能性不大,俗话说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中国银行显然不差这一层楼的钱,因而从经济上也难以解释这一层楼的变化。

在租界工部局的建筑规章中，一个核心思想是限制建筑物的高度，其中有一条规定，所有面向租界公共道路的新建筑物，其靠近临街地段的高度，不得大于道路宽度的1.5倍。但随着上海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，租界地皮的价格不断上升，业主挖空心思要最大化利用地皮，建造高楼大厦是大势所趋。无奈,工部局也不得不放宽标准。

海上金融

也就是说，只要建筑的楼房前面有相应的空地,包括道路,而且该空地(道路)不会再建筑其他建筑物,那么该楼的高度,可以相当于该空地1.5倍的宽度,甚至于有所突破。所有20年代以后建造的高楼，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规定建造的，当然在有良知的建筑师笔下，有的建筑物非不能也,而不为也,如沙逊大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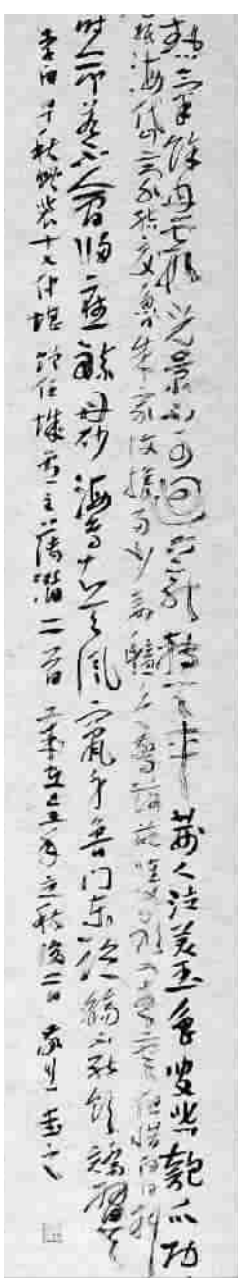
沙逊大厦实际高度77米，如果以该大楼东侧到外滩黄浦江的距离,按1.5倍计算，大厦建筑至100米高度都不成问题。同样,中行大楼的高度，确实可以按建筑师威尔逊的设想造至90余米。

可是工部局关于建筑规章,还有一些附加条件,如建筑物高度,既取决于它正面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,也取决于它侧面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。比如,沙逊大厦面对外滩的部分，可以设计造到77米、13层楼高，而面对南京路的建筑物部分,则因为宽度不及前者,只能设计造至10层楼为止。如此,我们姑且不论中国银行大楼面临外滩的正面部分,看看环绕它的其他几条马路，南侧的滇池路，西侧的圆明园路,均不如南京路的宽度,因此原先坐落西侧的另外一座塔楼，又如何得以起造呢？干脆砍掉了事，形成中行大楼前高后低的格局。中行大楼的后部与中间,都在8层以下,有的地方只有4层，大概也是这个缘故。

工部局对于建筑管理一向严格。现在还不敢断定，工部局建筑方面的法规，是导致中国银行大楼最终高度的决定性因素,但很可能沙逊就是利用了工部局对建筑法规的“解释权”。沙逊会说:“瞧,中国银行大楼对着外滩的空地与沙逊大厦一样宽,但其他方向都不如南京路,我加个尖顶也只有77米,他那个大方顶怎么可以超过我呢？这不是把整个外滩风貌都破坏掉了吗？”

因为师出有名，有法可据，工部局当然会予以干预，要求中行大楼的高度不得超过沙逊大厦,中行方面要拒绝也难。宋子文和张嘉璈、贝祖诒等人都是公认的精英人物,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必定会与这座城市的气质相符。

这一段,信手拈来,毋庸置疑属于想象的成分。想象与事实之间,隔着多远距离,取决于是否合理,就算是笔者在冥思苦想之际,自我“解套”的一记怪招吧。



书法(局部) 唐敬丝

建难毁易

鲍世远

我曾经在静安寺附近的小区里住过好些年，静安寺的素面是我小吃中的首选。素面有一种特殊的清香气味,吃来爽口开胃,久吃不厌。

可惜静安寺素面早就离我们而去,再也吃不到了。有些好东西,在它消失的时候更让人感到难舍难忘。现在,每当我经过静安寺,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和遗憾。

近来，听友人介绍,愚园路上近镇宁路口,开了一家素面店,店面不大,但素面好吃,有位老顾客吃着吃着竟然流下了眼泪，她说的是:“静安寺素面的味道终于回来了！”

我随即去尝鲜，发现店堂不仅清新整洁、还充满亲和力。老板告诉我,他从小喜欢静安寺的素面,几乎天天去吃,还和煮面的大师傅聊得很熟，无意中也学得了煮面的手艺。他一直想,有朝一日自己也要开一爿素面店,一定要把这份留存在儿时舌尖上的美味追回来……

从舌尖上的味道,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盖叫天先生请我和几位老朋友去小吃，当年上海福建中路(旧名石路)近九江路口，有家天津人开的小吃店叫复盛居，店面并不大,名气可不小。盖老是这里的常客，店里伙计们都认识他。我们在方桌四周坐定，盖老对伙计只需说“老规矩”三个字,不一会儿，伙计就端来刚出炉的火烧,加上卤肉、拌鸡丝和酸辣汤。盖老给我们示范:剖开火烧,夹几块卤肉和鸡丝,他边示范边说:“就这样一口饼一口汤的,叫你吃了永远忘不掉。”

据说,1956年曹聚仁从香港回到上海，专程赶到复盛居,只见小店风貌依旧,当年的小伙计都成了胖伙计,曹老如见亲人,吃完点心,买了一大包火烧和卤肉带回家。后来,复盛居易主,面貌变了,店名也不见了,满街都是眼花缭乱但十分雷同的食品服装,再也闻不到火烧和卤肉的香味了。

从静安寺素面和复盛居令人难忘的味道,使我想到,要销毁一样美好的事物太容易,而建造一样精美的作品却很困难。梁思成、林徽因旧居说拆就拆,而高楼上的那套“空中花园”,尽管居民们怨声载道,却可以“岿然不动”好多年。

我以为,给人们留下好味道,决不是一件小事。舌尖上永远难忘的好味道,是美好生活的反映,是热爱文化的表现。尊重人们的美好记忆，就是尊重人们的美好生活,保护好一件美好的物品,应该如同保护生命一样重要。

夜光杯

在美国不对号乘飞机

钱世锦

乘飞机必须先买票，然后依次到机场柜台换登机牌、过安检、进入机舱对号入座，这恐怕是天经地义,缺一不可。可是今年我在美国探亲乘飞机往返图桑和旧金山两地,却发现完全没有“对号入座”一说——每位旅客登机后先到先坐任何位子。

我乘的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(专飞美国国内）的波音737机型,我的机票是弟弟提前两天在网上预订的。他告诉我,“因为你是临时决定日程，因此票价要比提前买贵好多！”这与我们国内的做法一样。

但有一个做法却让我大吃一惊，那就是登机后所有乘客并不对号入座。我买的是6月21日中午12时从洛杉矶飞往图桑的航班。我乘的波音737飞机大约有180个座位,被分成A、B、C三个等级,每个等级各有60个号码。由于事先在网上认领登机牌拿到哪个等级,就在那个等级寻座。我去图桑拿到的是A49，而从图桑回旧金山拿到的是B35。获得号码是在家中电脑上,同时在家中把确认单打印出来。上飞机前的验关及登机时手里拿的都是这张确认“复印纸”,也就是纸质机票。

开始登机了,候机口等待区前,先亮出A的标记,这时所有手持A座的旅客自觉地在A1-30及A31-60的提示牌下按顺序排队,在被机场工作人员收走“复印纸”后,鱼贯进入机舱，随便挑选前后左右靠窗过道旁的位子入座。A队走完就轮到B，最后是C。整个过程秩序井然,没有争先恐后,都很有礼貌地出示打有号码的“复印件”,自动按次序排队入机舱。

飞机上只有两个服务员，她俩在飞机升空平稳后便拿着小本子来问每一位乘客需要什么饮料，并且十分认真地记了下来。送饮料的时候,没有手推车,而是每人手上一个托盘，一次放六杯不同的饮料分送到客人面前，并十分和蔼地说声“请”。飞机降落前她们会各提一个黑色垃圾袋来收杯子或看过的报纸杂物。这样的经历我在美国共有四次,感觉很新鲜。

听弟弟说西南航空公司是目前美国航空行业经营得最好的公司之一,准点率、利润积累都名列前茅。

蝴蝶梦回千里外

青 衫

有两句诗“蚂蚁也知春富贵，倒拖花片上粉墙”,我很喜欢蚂蚁是勤奋的动物，它常常激励我，可我一到春天乏得可以一丝丝不愿动弹。“啊哟哟,这次它们拖的不是花片,是一张蝴蝶残翼,这美丽的灵魂,何时折翅,莫不是连日下雨,翅重了,或是老了,生命真脆弱。”我喟叹着,总觉得这美丽的残翼将被蚂蚁一口口吞食掉,心有不甘,于是我俯下身去拾了起来,在树根下面挖了一个穴,把它埋了起来,想想它从遥远飞来,却葬在我园中,蝴蝶梦回千里外,虽是细事,也许它会出现我梦中,向我扑翅致谢哩!

多年前的那个“中”

徐思源

一批毕业二十多年的学生聚会,邀我参加。当年还是孩子,现在都是中年人了,聚在一起,谈起当年班里的趣事,讲毕业后的经历,欢声笑语不断。

一位男生笑着问我:“徐老师，还认识我吗?”我看着他,四十出头的年纪,脸上已有些岁月的刻痕,不过脸型没变,能想起当年的那个小调皮。有的老师很喜欢他的聪慧,也有老师讨厌他插嘴。当两张脸重叠在一起的时候,我不禁心生感慨,岁月不饶人呢!我笑说:“当然认识,你可是班里的开心果。”他也不改当年的性情,调侃说笑很是兴奋。

他在医药行业工作，于是大家向他打听买药吃药的各种事情。谈着谈着,说到了企业改制。他说单位也改制了,个人档案竟然放在自己抽屉里呢。说到这里,他甚至有些得意,“翻翻小时候的成绩和老师的评语,蛮有意思的。”他对班主任说:“老师,您当年可是给了我一个‘中’啊,您还记得吗？”当年的班主任努力回想,似乎没印象了。“是啊,品德等第‘中’。”说着说着,他脸上的笑容慢慢地僵住了,眼中闪出亮光,突然,他哭出了声,想要掩饰却止不住,头趴在桌上,哭声越来越大。

顿时全场震惊:怎么了？在嘀嘀咕咕开小会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,不停地问怎么回事。大家纷纷围上去劝慰他。几个男同学拉着他,“哭什么,大男人呐！”“都过去那么多年了,不想了！”同学们七嘴八舌。他带着哭腔说:“那可不是小事啊，你想想,‘品德中等’,有几个啊?等于‘品德差’啊!你们知道,看到那个红红的印章,我受到多大刺激吗？”

当年的班主任无比尴尬,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，对我低声嘀咕:“我当年给过他‘中’？我怎么想不起来呢？”——是啊,她已经想不起来了,对她来讲,这也许是很平常的,不会记在心里的一件小事,可对于一个学生,却有如此的影响,二十多年后,仍然难以走出阴影!

我当时大受震动,聚会回家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，那情景还不时会显现在眼前: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品德等第,一位四十出头的壮年男子,那止不住的伤心痛哭……

那个场面让我难忘,也引我深思。教师的一个批评、一点赞美,对学生是多么的重要,影响是多深远！我曾听到过诸如老师的讽刺让学生难过一辈子的事,也亲见遇到多年不见的老师,学生就不愿叫一声“老师”的情景,都让我感慨不已。“老师”这个称呼,许多当教师的未必觉得有多神圣,但“老师”在学生心中是神圣的,他们非常重视老师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,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。

又过了好几年,我现在想的是,我们评价学生品德究竟有没有合理的依据？教师能不能仅仅因为学生的一些表现就轻易地给他们的品德打等第,贴标签？

十日谈

点亮一盏灯

每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唯一。